

## 全球語境與台灣地方書寫 (I) 結案報告——

### 當代台灣小說的「南部」書寫

范銘如

自解嚴以來，尤其九〇年代後期，台灣文學的環境丕變。各縣市政府踴躍形塑其區域特色，除了舉辦各類活動或慶典，地方文獻的整理、出版，文學獎項的引導，都是凝聚地方意象並提高能見度的常見策略。其作用固有文化保存的效果，亦有將共構出的原鄉特質轉變為文化資本，促進觀光、活絡產業，甚至成為吸引國際交流的基礎。在資金、資訊快速交換流動的全球化趨勢中，地方書寫不僅保留本土記憶、建構文化身分及原鄉與外地的時空差異，同時可能將此種差異轉變為同質化全球語境裡的顯著標地。

理論上儘管言之鑿鑿，落實到實踐面檢視，論者不免要質疑，在幅員相對狹小、交通便利且人口流動往來頻繁的台灣，區域景觀及特徵是否鮮明可辨？書寫地方，不管是都會或鄉村，是否能夠寫出獨特的當地景物、地誌、風俗歷史以及最重要的人文特性？地理環境因素及政經開發的不同，是否讓台灣文學發展出不同特質或不同關注的區域文學？這些龐大而絲縷牽纏的問題不僅僅牽涉到文學的走向，更攸關文化政策、區域發展以及認同政治諸層面之於文本的交互作用力。單單一篇文學評析的小論文雖然無能面面俱到，提供所有問題的解答，至少可以就文本裏地方再現的特色提出基礎性的歸納分析，以供博雅賢達進行更全面性的後續研考。由於地方書寫的作品太過龐雜，本文勢必得放大地方的定義範圍，無法就每一縣市作品獨立考量。因此我權宜地將解嚴後的台灣小說分成南、北、東三區，一來遷就自然地理的東西分野，二來趁機檢視西部區域裏不成文卻眾說紛紜的南北文化差異是否見諸於文學創作之中。本論文將先從書寫南部的小說作品、南部縣市文學獎的優勝小說開始，分析文本中地方圖象的嬗變的軌跡，並探討想像、再現南部的地方書寫策略與美學特徵。東部與北部書寫的小說研究容後另文專論。我深知這樣的區分太過不智，不管從文學創作或閱讀的特性而言，流動性都超越地域性，但一味忽視地域對文學的

可能影響而懸空侈談台灣文學的獨特性無異自失立場。我希望從實際批評裏說明台灣文學地理現有的模糊輪廓，包括蔡素芬、吳錦發、鍾文音、陳雪、葉石濤、賴香吟、王家祥、李昂、施叔青、陳玉慧以及眾多地方文學獎寫手的文本，「南部」在小說再現裏往往以一種歷史性的意義出現，是個人生命或台灣歷史的源頭。然而這種歷史卻不是一種區域內部自發性的歷時性演進，而總是與外地或外族的文化勢力對照拉扯。因此書寫南部，就某種程度上來說，即是書寫歷史上的台灣。

「南方」是一個變動性、語境性的地理概念，企圖為南方文學訂立本質上的定義無異於緣木求魚，南部的文本再現亦將是變動不居的建構工程。儘管如此，由於空間實踐或想像皆無法自外於表義系統的運作，地方再現的模式亦非無跡可循。本文無意也無能為南部書寫提出預設式的理論或結論，僅能就九〇年代以迄書寫南部的小說歸納出暫時性、權宜性的初步觀察。本篇論文選擇的文本將採取空間再現的定義，不管作家的籍貫和地緣關係，只要是大量描繪具體確切的實境地點，而非只是故事發生的背景或影射性的擬境。簡言之，本文側重的將是能具體指涉故事地點的小說，以便理解是否在再現地方的書寫方式中已形塑出某些模式與特徵，進而試問是否可能有「南部」的集合文學特質？我想探問的是，當代小說偏好呈現何種南部地誌與人文？南方是否已被形塑出特定的符徵與意識型態？讓它足以與其他區域區隔，形成一個文學地理上的南部特質？

從目前書寫南部的小說來看，歷史性的強調是重要的特性。第一種是把地方與個人聯結，透過人物的成長蛻變或尋根懷舊，側寫鄉土景誌的變遷、社群情感或文化風俗的綿延牽繫。地方史與個體生命史交織，彰顯出兩者相互銘刻於彼此的印記。第二種則加重地誌歷史，由倖存或銷毀於地表的陳跡追溯地方文化、政經的淵源，特別是對外族、外國關係的歷史。此種敘述模式經常發揮部分替代全部的轉喻功能，將地方轉換成台灣的縮影，演繹國族史話。前者可說是地方書寫的正宗，廣泛地被運用於再現南部、東部和北部各區域的文本，所不同者在於如何細膩精準地呈現出該區獨特人文、景觀的演變。後者則是九〇年代以來南部書

寫的一大特點，與東部和北部書寫的敘述重點不同，以南部地方過往的涉外經歷折射台灣歷史的滄桑。

綜合各個縣市的地方書寫來回答論文一開始的設問：小說裡的南部究竟指涉那些地理範圍？從小說的實際批評裡，明眼的讀者不難看出，當前文學地理裡的南部包括台中、彰投、雲嘉南、以迄高屏等地區。各縣市的地誌書寫不約而同形構了某種類似的區域風景與氛圍。小說地景多取材於鄉村或都市的老舊社區，鮮少描繪縣市首府中最現代、最都會生活的面向。在這些文本再現裡，地方的景觀多偏好以過去式的方式呈現，居民的經濟生產方式大部分為傳統農、漁產業，部分的小額自營商業；寬闊、炎熱的自然環境對比由矮窄陰暗（木板、磚泥）平房及低層樓房雜錯組成的鄉鎮街坊或市集。一般而言，地方上的時間緩慢寧靜但個體感受的空間未必有相同的對應。民間習俗或禮儀信仰融入日常生活實踐中，親屬朋友的往來或牽絆頻繁密切，家庭和社群的凝聚力比較強烈，對個體的約束力相對強大。出自對這種人際網絡的反抗，或是對於家鄉落後的自覺，小說主角常會以離鄉當做自我成長過程的必要條件，最終卻也正是在家族情感或地方文化的召喚下，釐清自我與家族、地方過往的悲喜滄桑之後完成主體性的建構。

當我們從文本內緣分析往外緣條件延伸觀察時，可以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作者所處地理位置與土地認同之間似乎存在著悖逆的辯證距離——作者都在外地書寫家鄉。譬如描寫鹽田栩栩如生的《鹽田兒女》是蔡素芬旅居美國時對母親故鄉的想像；〈島〉與〈熱蘭遮〉是賴香吟留學日本時在新宿街頭偶見一張台灣電影海報引發「對島嶼性格的無數聯想」（賴香吟，199）；《行過洛津》的初稿是施叔青移居紐約曼哈頓時閉關，「終日與泛黃的舊照片、歷史文籍為伴，在古雅的南管音樂與蔡振南〈母親的名叫台灣〉的激情呼喊交錯聲中，」參照印象記憶中的故鄉景致而重塑出的清代鹿港風貌（施叔青，351）；陳玉慧亦是在國外住過大半人生、定居德國多年之後才藉由書寫《海神家族》返顧自己與家人台灣的臍帶關連；吳錦發、李昂、鍾文音、陳雪這些原籍南部縣市作家的地方小

說都是與居住台北時完成的作品。所謂南北對峙的緊張關係，或反台北思維的說法，在這些書誌南部的小說中並不鮮明可辨。

作家本身與鄉土的關係某種程度地呼應解釋了小說主角們的歷程，也說明了南部書寫為何常常與個人的記憶、過往的生活歷程結合。地方感的產生或再現往往跟記憶糾纏在一起，記憶容或是片斷性、私密性或隨機性的，但也可能是集體性的。當作家憑藉自己的經驗或印象形塑地誌時，有時不免透過其他表徵性的文物，例如照片、音樂、文獻、碑誌、古蹟、博物館等等，激發出地方想像。地方文學書寫的同時即已攙加不同類型的再現文本，之間既有有意識地選擇或者是不自覺地聚焦、紀念某種共同的記憶；南部地景的再現具有地理與社會現實的基礎，文本本身亦可能是主導象徵體系再生產的重要環節之一。當代台灣小說將南部想像與個人或集體歷史的聯結傾向，也許導因於對長久以來重北輕南政策的反思，或是解嚴以來本土化意識的結晶，或許是兩者交互作用下的影響。我絕不是指稱上述這些著重尋根或史觀重建的南部書寫是被建構而成甚或迎合官方論述——何況證諸許多作品發表日期遠在「本土」真正贏得政治正當性之先，我想解釋的是這個再現的特質與九〇年代以來台灣社會的本土化運動確是併行不悖。因為歷史性的強調一方面暗示南部地區的落後時態，另一方面卻剛好是一種「正港」的標誌，表明南部是台灣發展的源頭。只不過這種對台原正朔的建構是台灣意識的抬頭，而非內向式史觀企圖從現代化或全球化的現狀往遠古遁逃。文本對南部地方與外地、外族、外國的交往、媒合多所著墨，連族群傾軋的歷史罪惡亦能自省式檢視，彰顯台灣並非只有中國的影響與交流，反轉過去中原文化一支獨秀的迷思。多元文化與移民傳統的強調，益發凸顯南部/台灣的主體性與能動力早在歷史過程中開展確立。融合記憶、歷史兼具政治意義與美學風格的南部書寫是否能夠成功轉化成為具備經濟效益的文化、觀光產業，為振興地方注入活水，目前雖言之過早，但我們已經在七股鹽田的案例中看到文學、地方產業與觀光活動合作的模式。即使兩者得以順利媒合製造無限商機，轉化的過程中究竟能產生加乘的效果強化地方認同，抑或會將前者強調的歷史深度意義置換為仿

古、懷舊性的消費慶典，恐怕才是熱中推動文學產業化或觀光化的官方、地方工作者更應留意的發展。